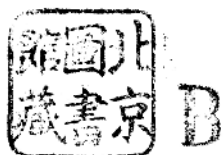


广西历史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暨八十年会

# 会 刊

广西历史学会秘书处编



087503  
目 录

1980

## 一、大会工作报告

### 广西历史学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暨

|                                |           |
|--------------------------------|-----------|
| 一九八〇年年会开幕词·····                | 张景宁 ( 1 ) |
| 广西历史学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工作报告·····       | 林克武 ( 2 ) |
| 广西历史学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暨一九八〇年年会总结····· | 陈伟芳 ( 6 ) |

## 二、论文选载

|                                    |                |
|------------------------------------|----------------|
| 论桂林甑皮岩遗址的文化特征·····                 | 赴 平 张益桂 ( 10 ) |
| 从考古发现探讨历史上的西瓯·····                 | 蒋廷瑜 ( 14 )     |
| 苍梧部族考·····                         | 梁茂宏 ( 21 )     |
| 骆越与广西壮族及越南民族的历史渊源关系·····           | 黄国安 ( 25 )     |
| 试论奴隶社会并非阶级社会必经的历史阶段兼论商朝不是奴隶社会····· | 黄伟城 ( 30 )     |
| 略谈我国古代忠君思想的起源和演变·····              | 宋子英 钱宗范 ( 40 ) |
| 略论张良·····                          | 徐硕如 ( 44 )     |
| 《龙城石刻》是“讨武傲文”吗? ·····              | 谢汉强 ( 48 )     |
| 试论中柬关系史的三个问题·····                  | 赵和曼 ( 50 )     |
| 论马援征交趾——兼论二征起事的一些问题·····           | 黄 铮 ( 57 )     |
| 金田起义日期再考·····                      | 罗尔纲 ( 65 )     |
| 杨秀清代天父传言的宗教本质·····                 | 邢凤麟 ( 72 )     |
| 永安战场敌我兵力人数的探讨·····                 | 朱哲芳 ( 78 )     |
| 天国英雄 悲剧人物——试论天京事变后的石达开·····        | 张 胤 ( 84 )     |
| 石达开在庆远·····                        | 李彦福 莫瑞扬 ( 93 ) |
| 刘永福的黑旗军在越南的抗法斗争·····               | 杨万秀 ( 95 )     |
| 清末广西会党起义的原因及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        | 沈奕巨 ( 104 )    |

|                                  |           |
|----------------------------------|-----------|
| 资产阶级革命家宋教仁的一生·····               | 李英庭 (111) |
| 论辛亥革命的失败·····                    | 徐方治 (116) |
| 陆荣廷军阀政权的出现和覆灭·····               | 莫 杰 (121) |
| 陆荣廷事略·····                       | 韦瑞霖 (128) |
| 马列主义的传播和广西党组织的建立·····            | 陈欣德 (135) |
| 广西第一个共产党支部为何在梧州建立·····           | 李业安 (139) |
| 试论东兰农民运动发生的社会原因及其意义·····         | 杨 敏 (142) |
| 试论东里共耕社·····                     | 刘映华 (147) |
| 浅谈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财政金融·····             | 郑家度 (153) |
| 三、广西历史学会第二次代表会代表名单 ·····         | (158)     |
| 四、广西历史学会第二届理事及领导成员名单 ·····       | (159)     |
| 五、广西历史学会第二次代表会暨一九八〇年年会论文目录 ····· | (160)     |

# 广西历史学会第二次会员代表会 暨一九八〇年年会开幕词

张景宁

同志们：在党委的领导和关怀下，广西历史学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暨一九八〇年年会今天开幕了。我向同志们致以热烈的祝贺！

这次会议是在国内外一派大好形势下召开的。出席大会的代表共80多人，收到论文60多篇。这次大会的任务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最近召开的五中全会的精神，认清形势；检阅成果、交流经验；改选领导机构，制定规划，动员我区广大史学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大会的具体议程是：听取工作报告，传达重建中国史学会会议精神、宣读、讨论学术论文、修改会章、改选理事，制定规划。希望与会代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大会的各项议程，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民主、生动、活泼的大会。

最后，祝大会圆满成功！

# 广西历史学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工作报告

林克武

同志们：

广西历史学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和一九八〇年年会今天同时召开。这是全区史学工作者的一件大喜事。

广西史学会于一九六三年成立后，曾经中断活动了多年。去年五月，在区党委的领导下，召开了理事扩大会议，恢复了活动。一年来，区党委对史学会的工作做了许多具体的指导，给了很大的帮助。今天，区党委宣传部领导同志又亲自参加我们的大会，这是上级领导对我们的关怀和支持。在这里，我代表广西历史学会，代表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有八十四人。这当中，有广西历史学会首届理事和首批会员，也有去年理事扩大会议增补的理事和去年以来新发展的会员。今天，我们大家欢聚一堂，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共同商讨发展我区历史科学的大事，这是十分值得庆祝的事情。我们这次大会的召开，一定会对我区的历史研究工作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自广西历史学会于一九六三年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以来，已经过十七个年头了。这十多年中，我们历史学会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发展道路。广西史学会成立时，郭沫若、包尔汉、谢扶民、翦伯赞等同志亲自到广西指导工作，对我区的史学工作者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年，我区史学界的学术研究空气是浓厚的，研究工作的成果是显著的。可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我区的历史研究工作受到很大干扰和破坏。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长期以来，在史学领域疯狂进行反革命破坏。他们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打击和迫害历史学家，封禁历史著作，解散研究机构，取消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他们随心所欲地歪曲和篡改历史，大搞影射史学。批宰相，捧法家，吹女皇，借古讽今，恶毒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被他们糟塌得不成样子。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横行，我区历史科学研究一度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一些研究机构被解散了，不少史学工作者受到打击和迫害，长期积累的图书资料大量散失。林彪、“四人帮”也禁锢了研究人员思想，败坏了研究风气，窒息了学术研究。粉碎“四人帮”，史学得解放。我区历史学界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在区党委的关怀下，一些被解散的研究机构恢复了，并且扩大了；一些新的研究机构成立了；被打散了的史学队伍重新聚集起来，并且壮大了。更重要的是，通过揭批“四人帮”，党的“双百”方针得到了贯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得到发扬，史学领域的禁区一个一个被冲开，广大史学工作者可以心情舒畅地著书立说，自由地切实地研究和探讨各种学术问题了。这样，我区的历史研究工作就开始出现了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从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回顾广西史学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以来的十七年，尽管中间有长达十年的“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受到不少损失，但是，在区党委的领导下，在全区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区的史学研究工作还是有一定的成绩的。今天，在广西史学会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对过去我们所做的工作作出实事求是的估价。

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以来，我们广西史学界做了哪些工作呢？

在民族史的研究方面。多年来，我区史学工作者以极大的热忱投入了我区民族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和编写工作，并且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区民族研究所和各有关单位密切合作，很早就编写出《壮族简史》、《瑶族简史》、《毛难、仡佬族简史》的初稿。粉碎“四人帮”后，《壮族简史》很快就修改定稿，最近即将正式出版。《瑶族简史》也在修改之中。与此同时，先后召开了几次民族史学术讨论会，深入讨论了有关民族历史的一些问题。如前段召开的瑶族史学术讨论会，对瑶族的族源、瑶族的社会历史分期，解放前瑶族地区的社会性质、瑶族社会历史特点等问题都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弄清了一些问题。广西民族研究所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还编写了《今日广西少数民族》一书，于去年底出版；他们编写的《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石刻碑文资料》一书的文稿，也已送出版社，准备出版。我区的一些高等学校，在搞好教学工作的同时，也积极开展对民族史的调查和研究，整理了一批资料，写出了一些论著，如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室近年来编写出了《广西壮族历史人物传》。

在地方史的研究方面。我区史学工作者对广西的历史，特别是广西近百年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原区通志馆和其他一些单位，对广西的历史资料，如有关中法战争、太平天国的历史资料、《明实录》和《清实录》中的广西史料，很早就进行了收集和整理。区政协历年来，征集到的广西文史的资料就达一千八百多万字，他们编辑的《广西文史资料》已经出到第八集。此外，莫乃群同志主持编写的《广西地方简史》一书，受到读者欢迎。桂林的史学工作者，编写了《桂林史话》和《桂林石刻》，其中，《桂林史话》已经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南宁的史学工作者编写的《南宁史话》也即将由区人民出版社出版。柳州的史学工作者，研究柳宗元以及其他一些有地方特色的问题，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在有关单位的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区还调查和整理了《大藤峡农民起义资料》。近年来，对广西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桂系军阀的研究也进了一步。有关单位共同协作，编出了一个《桂系军阀研究资料索引》，并且写出了一批有关辛亥革命新旧桂系军阀的研究论文。武鸣县有关单位还搞了个《陆荣廷资料汇编》，并写出了一些研究陆荣廷的论文。我区的史学工作者还正在进行《广西民国人物传》的编写工作。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研究方面。区革命史编委会办公室从一九七五年开始，就进行广西革命烈士的资料整理工作，目前，已完成了一批革命烈士的传略，并征集了《红七军红八军回忆录》的一批文稿。编写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专题资料。区文化局组织有关单位进行了广西左右江革命历史的专题调查，编印了《左右江革命史资料》共三集。区博物馆的同志编写的《百色起义》一书，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区有关单位还共同组织了“红军长征过广西”的调查、“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和各县工农民主政府的调查，广西建党活动调查等等，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玉林地区、百色、田东、东兰等地的有关部门和史学工作者，也调查和整理了当地的一些极有价值的革命史资料。去年十二月，有关单位共同召开了百色起义学术讨论会，会上收到了革命史的论文二十多篇。这次讨论会，对百色起义的社会背景、起义发展过程、斗争策略、历史经验以及人物评价，都作了比较广泛和深入的探讨。近年来，我区一些大专院校从事现代史和党史教学工作的同志，也开始扭转了过去不大重视地方党史和革命史研究的情况，积极进行了地方革命史的研究，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在太平天国史研究方面。多年来，我区史学工作者以极大的兴趣进行太平天国史的研

究,取得很大的成绩。目前我区史学工作者参加编写已经出版的专著就有《金田起义》、《太平军在永安》、《冯云山》以及《太平天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许多史学工作者撰写了不少太平天国史的专题论文。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许多同志能敞开思想对太平天国历史中的一些重要而争论较大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新的见解,不久前在桂平召开的我区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收到的论文就有二十九篇,涉及到了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思想、人物评价等方面。明年是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一百三十周年,我区准备编辑出版一本《广西太平天国史研究论文集》,现在这个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另外,明年二、三月间,广西、广东准备联合举办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我区的史学工作者正在为这次会议积极准备论文,完全可以相信,到时我区会涌现一批太平天国史的新的研究成果。

在文物考古方面。我区博物馆和文物工作队等单位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经过长期的努力,现在,我们广西已经发现了从原始社会到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以及此后各个历史时期的许多遗址,出土了许多历史文物。区博物馆、区文物队先后整理和撰写了几十篇考古发掘报告和研究论文,其中有的论文和报告在国内外考古学界受到重视。同时他们还依靠群众,完成了南宁、玉林、梧州、桂林四个地区的考古调查。近年来,他们对古代铜鼓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最近,由中国民族研究学会、文物出版社和区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全国首次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这次讨论会,就古代铜鼓起源、类型、分布、年代族属、用途、装饰艺术、铸造工艺等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提出了不少新材料,新观点。我区考古工作者也积极参加了研讨。

我区史学界的另一个重的成绩,就是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历史学会的组织机构更加完善了,会员发展了,活动也越来越正常了。现在,广西史学会已拥有会员五百多人,遍布于全区八个地区、四个市。柳州市和梧州市也成立了历史学会。作为广西史学会的分支机构。去年以来,我区史学界还陆续成立了一些专门性的研究会,如:广西民族史研究会、太平天国史研究会、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桂系军阀史研究会、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会,以及与革命史研究会合在一起的中共党史研究会广西分会,中共党史人物传研究会广西分会等。此外,还有印度支那研究会。这个研究会成立以来,团结全体会员,积极开展对印支三国的历史问题、现状问题,中国与印支各国关系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受到了有关方面的欢迎和重视。我区史学界的各个研究会,都相应地参加了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一些学会和研究会,大家同兄弟省区的史学工作者一起,互相流交,互相学习,互相切磋,共同探讨和研究问题,促进和推动了我区的历史研究工作。

以上就是第一次会员代表会以来,我区史学界所做的一些工作,所取得的一些成果。由于我掌握的情况不全面和具体,可能会有遗漏。同志们可以在讨论时共同总结,加以补充。总之,我们认为,我区史学界的工作成绩是应当肯定的。应该指出,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破坏,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基础上继续工作,继续前进,我们取得的成绪还会大得多。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困难还很多。我们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我们的任务还很繁重,我们还要做前人还没有做的巨大的工作。

就拿广西地方史的研究来说。我们广西的历史,还有许多空白点,存在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在秦以前,广西的历史没有文学记载,由于与中原隔离,连记载下来的传说的东西也不多。地下发掘的历史资料也还少。这一时期的社会性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情况

还必须进一步的探讨。这与研究全国历史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

秦以后，广西统一在中国的版图之内。但是当时统治所及，还是由点到线，逐步到面的。明代中叶起“改土归流”，到清代初期才基本上完成。在广大的面上，地区之间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社会的性质也可能各有差异。加上广西是多民族地区，各民族的发展差别更大。如汉族进入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的时候，瑶族可能还是奴隶社会。就是广西的近代史以及其中比较重大的历史事件，如太平天国、中法战争、辛亥革命、新旧桂系等，也存在着资料不足，要进一步搜集的问题，存在着许多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总之，我们研究广西的历史，比起研究一般的中国历史来说，任务更繁重，工作更艰巨，更复杂。历史交给我们的担子很大，很重。

从我们的主观力量来看，我们广西虽然已经形成了一支史学工作的队伍，有了一定的骨干。但由于我们的工作任务重，存在的问题多，就显得我们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的力量是薄弱的，不足的。而我们的组织工作又跟不上，我们有限的力量还存在稍为分散，不够集中，不能发挥更大的效能的现象。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商讨、研究，求得解决。

我们这次会议开会时间不长，但内容很多，我们要对过去的工作进行总结，分析形势，交流经验，并结合贯彻最近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史学会重建大会的精神，讨论会后我区的历史研究工作。我们还要通过民主协商，选举产生广西史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并修改广西史学会章程的某些条文。在这次大会上，我们还要交流研究成果。这次会议收到的史学论文共七十多篇，我们将选择一些论文在大会上进行交流。总之，这次会议的任务是很繁重的，活动是很紧的。我们希望同志们共同努力，把这次会议开好。

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很好，我们历史研究工作的形势也很好。尽管我们还面临着那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和困难，但是，前景是十分光明的。打倒“四人帮”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党中央领导的正确，制定和贯彻了一条正确的政治、思想、组织路线，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恢复了历史研究的优良传统，贯彻了“双百”方针，为我们从事历史研究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我们的积极性更大地调动起来了，我们的步子迈得更大了，工作做得更好了。我们应该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团结一致，乘胜前进。

在最近召开的中国史学会重建大会上，胡乔木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详细地说明了研究历史的重大意义，并且阐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历史科学和政治的相互关系等有关发展我国史学的重要问题。胡乔木同志指出：“不论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从我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国来说，从历史地亦即全面地、系统地、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现实问题的需要来说，都不能不加强历史科学研究。”胡乔木同志还指出，“我们要认真研究中国史、世界史、地方史、民族关系史、对外关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政治制度史、政治生活史。不仅要作通史或断代史的研究，还需要用更多的力量进行富有意义的专题的研究。可见，历史科学面临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也是十分光荣的。我们广西史学界的同志们，要兢兢业业，同心同德，把历史科学研究搞上去，以更多更新的研究成果，贡献给祖国和人民。

至于今后的工作应该怎样搞，这里没有谈到。希望同志们在会上认真发表意见，交换看法，在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之后，再加以集中，可能提得更准确一些，更妥善些。

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大家批评指正。

最后，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 广西历史学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暨 一九八〇年年会总结报告

陈伟芳

同志们：

在区党委的领导与关怀下，经过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我们这次大会已经圆满地完成各项任务，今天就要结束了。我受大会的委托，对这次会议作初步的总结。根据许多代表反映，会议虽然只开了短短的五天，但收获是很大的，主要表现在：

第一，提高了思想认识。大会期间，我们听取了自治区领导同志的讲话，传达了四月间重建中国史学会全国代表会议精神，特别是胡乔木同志在会上的讲话。大家经过漫谈讨论，澄清了某些思想混乱，提高了对历史科学重要性的认识，明确了不少重大理论问题。例如，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历史学的关系问题，我们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对研究历史的重要性，它是向导，但不能代替一切。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历史，从分析复杂的历史事实中，得出科学的结论。那种认为解放思想就可以脱离马克思主义去研究历史的倾向是错误的，因为它将把我们的研究工作引向歧途；那种满足于搞点资料而忽视理论研究的倾向也是错误的。因为历史资料固然是很重要的，但它本身还不能成为历史学。通过讨论，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历史科学是马克思主义不可缺少的基础之一，马克思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历史材料的基础上，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要不断用历史科学以及其他科学所提供的新成果来丰富自己，只有这样，才能经常保持它的强大的生命力。这个论点充分说明了研究历史的重大意义。党中央对历史科学历来都是非常重视的，历史教学和研究，对于提高全民族文化知识水平、加强思想品德教育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们史学工作者肩负的责任是艰巨的、光荣的。又例如，历史科学与现实政治的相互关系问题，过去“四人帮”大搞影射史学，肆意伪造和歪曲历史，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阴谋服务，把历史学糟塌得不成样子。其流毒影响，造成一些人认识不清，行动上畏缩不前。现在大家明白了政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历史科学既不可脱离政治，又不能违背、歪曲客观历史事实为某种政治需要服务，搞牵强附会，那样将不仅破坏历史科学，也将损害社会主义政治。历史科学满足政治需要的正确理解是：历史向社会也向政治提供新的科学研究的成果，而社会政治则利用这种成果作为自己活动的依据，许多代表说，思想认识提高以后，我们就应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历史，要抱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自己的科学研究中创造出新的成果，提出与现实问题直接有关的科学见解或建议，写出高水平的著作，推动学术进步，争得祖国荣誉，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区党委领导同志对我区历史科学的重视，使到会代表深受鼓舞。贺亦然同志代表区党委对繁荣学术讨论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方针与政策，特别是关于认真贯彻“双百”方针，执行“三不主义”，以及史学工作者要为真理而奋斗等问题，讲得深入浅出，说出了大家的心里

话，从而使一些同志放下了思想包袱，增强了攀登科学高峰的决心与信心。一些代表说，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发生在我区，一些重要文物也发现在我区，现在，区党委大力支持我们抓紧时间搞好调查与研究，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争分夺秒，发奋努力，多出成果呢？总之，这次大会使全体代表明确了方向，提高了思想认识，鼓舞了研究历史的积极性。

第二、进行了学术交流。检阅科学研究的成果，是我们这次大会任务之一。这次会议共收到已定稿的学术论文73篇，其中有关太平天国史的10篇，广西古代史17篇，辛亥革命史2篇，桂系军阀史5篇，新民主主义革命史8篇，广西民族史5篇，印度支那史8篇，其他内容的18篇。

收到这么多的论文，内容是如此的广泛，这在我区史学界是个很可喜的现象。会议安排了较多的时间，对这些学术论文分组进行讨论，组织大会发言。大家对洪秀全的早期思想问题，石达开的评价问题，桂系军阀的概念问题，依志高起兵反宋的性质问题、秦代象郡的位置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争论，互相都得到了启发与提高。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我国著名的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同志，得知我们这次会议召开，立即寄了一篇《金田起义日期考》的论文来参加讨论，他年逾八十，连夜赶抄论文一直到清晨四点半钟，这种热爱家乡、热爱科学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第三、改选了领导机构。按照我区历史学会章程，我们这次会员代表大会进行了理事会的改选，产生了第二届理事会。第一届理事会在团结全区史学工作者向历史科学进军、组织各种专业研究会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第二届理事会从28人增到48人，各方面的代表都有，第一次有了女理事，这样，理事会联系会员就更加广泛了。第二届理事会中我区十二个地、市都有一名理事，这样，历史学会与各地、市、县的联系也加强了。我们还经过群众酝酿提名，建议理事会聘请区人大常委会付主任林克武同志、广西师院历史教授黄现璠同志、广西军区付政委王侨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罗尔纲同志为顾问，这些老同志很关心和支持史学会的工作，对我今后工作的顺利开展能发挥很大作用。

我们希望第二届理事会把历史学会工作的重担很好地担当起来，希望新当选的各位理事密切联系群众，搞好本职工作，出色地完成学会的各项任务。

会议期间，我们专门安排了时间，给大家讨论今后的工作问题，全体代表怀着满腔热情，以主人翁的姿态提出了许多工作意见与建议。第二届理事会将认真加以研究，分别轻重缓急，落实执行。这些建议牵涉的问题，有的是靠我们学会解决不了的，或者是目前办不到的，我们将系统整理成文转送给区党委、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供领导研究；有的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的，那就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把事情办好。

第四、加强了相互了解。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共84人，来自区内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48人，各地市县代表36人，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24岁，代表之中有历史教授与专家，有研究人员与文物工作者，有中学历史教师，也有战斗在不同岗位的业余爱好者，代表的广泛性是前所未有的。这也反映了我区史学会近年的发展，逐渐成为真正的群众性的学术组织。今天，来自四面八方的代表，聚首一堂，交流经验，互相学习，使学会与会员之间的相互了解加强了，为今后联系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有的代表说，过去“人地生疏”“耳朵不灵”，现在“促膝交谈”，友谊建立，今后大家就可以“步调一致向前进”了。

关于今后的工作，总的指导思想是：团结起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向新的领域、新的高度进军，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具体提出下面几点意见和要求：

①要制定好规划。关于规划，一九七八年年底曾制定过一次，现在，由于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的认识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所以以前的那个规划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需要，必须加以修改或重新制定。首先，各研究会要订出规划，作为自己开展学术活动的依据。制定规划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写下去要做得好。规划的内容既要有与全国有关的项目，也要有反映广西特点的项目，特别是广西地方志的编写，有关广西某些史料的抢救，是个迫切的问题，在规划时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规划要分清轻重缓急，保证重点项目的完成。各研究会的规划订好以后，再制定全区史学会的规划。不管是各研究会的规划，或是区史学会的规划，都要注意检查执行情况，及时解决执行中所碰到的问题，切切实实的把工作做好。

②进一步开展学术活动。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区史学界迎来了百花盛开的春天，广大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心情舒畅，纷纷著书立说，讨论学术问题，已出版和即将出版的著作达十本之多，去年一年就召开了三次比较大型的学术讨论会（瑶族史讨论会、太平天国史讨论会、百色起义讨论会）和许多次中小型讨论会，写成了几百篇学术论文，这种情景是令人鼓舞的，今后，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术水平，把历史研究搞得更活跃，更扎实。

现在，各个研究会都初步规划了今后的学术活动，例如：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准备在明年与广东联合召开纪念太平天国起义一百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邀请各兄弟省市的代表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会准备今年九月在梧州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内容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西的群众运动；明年是我们党诞生六十周年，我们学会也准备举行一些学术活动。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准备在明年三月份在梧州召开一次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印度支那研究会既研究历史，又探讨现状，准备在今年年底举行一次较大的学术讨论会。民族史研究会准备在今年下半年召开少数民族史学术讨论会。除各研究会开展学术讨论外，各地、市、县还可根据自己的特点与条件开展学术活动，组织会员研究一些课题，收集整理有关资料等等。现在有的同志倡议编写《广西丛书》，这很好，希望大家大力支持。在开展学术活动中，我们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执行“三不主义”；开展活动要讲求实效，不要流于形式；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活动。

③要保证重点项目的完成。各研究会在实现规划，开展活动的过程中，要考虑到重点项目的数量与质量，使它们具有较高的水平，并保证按期完成。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准备在明明年出版纪念太平天国一百三十周年论文集；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会准备写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百色起义》；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准备在明年写出《辛亥革命在广西》；桂系军阀史研究会准备今年完成《民国广西人物传》第一卷，明年完成《广西大事记》（1905——1949）；民族史研究会准备在这几年内陆续写出《瑶族简史》、《壮族近代史》、《京族简史》、《仫佬族简史》、广西八个自治县少数民族概况（共八本）；印度支那研究会编写的《中越关系大事记》已出版，准备在今年编写出《中柬关系大事记》、《中老关系大事记》、明年写出《越南简史》、《柬埔寨简史》、《老挝简史》。我们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些重点项目是能够按期完成的。

④进一步扩大组织，健全机构。我区史学会自去年恢复以来，现在已拥有五百多名会员，遍布于全区八个地区、四个市，柳州市和梧州市还分别成立了市属历史学会。我区史学

界还陆续成立了五个专门性的研究会,和一些研究小组。组织发展的情况是令人兴奋的。

史学会是群众性的学术团体,是联系群众的纽带。现在,全区还有许多史学工作者与业余爱好者迫切要求入会,所以,我们不能满足于现有的成绩,有必要进一步做好新会员的发展工作,有重点地把符合条件的同志吸收到史学会和各种研究会中来,增加新的血液。会员入会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人会员,一种是团体会员,均按照史学会章程办理。这里顺便谈谈区史学会与各地市史学会的关系问题。根据中国史学会章程规定,经过申请批准,各省区的史学会都作为团体会员,中国史学会与各省区的史学会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参照这一精神,我们区史学会与各地、市学会也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所以各地、市史学会在独立开展活动时遇到的一些困难,例如经费,人员等问题,应该依靠当地党委和政府酌情解决。

组织扩大以后,必须健全机构。区史学会与各地史学会的日常工作,在目前还暂时不能配备专职干部的情况下,要请一些同志兼任,各项工作都要有人去抓,分工负责。现在各地市都已有理事,有条件的地方也可成立史学会,没有条件的可暂成立小组,以团结更多的史学工作者开展活动。区史学会与各地、市史学会都要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个经常性的任务,使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一代胜过一代。为了方便专业性研究的开展,在可能的情况下还可再成立一些研究会。

⑤加强互相协作。会议期间,不少代表呼吁要互相协作,这说明大家的精神面貌大有进步,真正认识到这是进一步开展学术研究的需要。互相帮助与合作,是科学工作者的美德,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提倡互相协作,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不要互相封锁,搞重复的无效劳动。当然,在学术研究中主要靠个人去钻研,这是基础,但也可采取个人与集体结合,几个单位之间共同搞科研项目的方法。各个研究会可发动会员把本专业的有关资料编成资料索引,方便大家共同使用。各研究会每年可把会员的研究成果编成简报,以利于学术交流。

同志们,我们的成绩是不少的,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希望各位代表回到各个地区、各个单位后,积极把各项工作开展起来,希望在下次代表大会上,能看到历史科研之花,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日

(上接13页)

⑤上海博物馆:《中国原始社会参考图集》,二十六页。

⑥李炎贤、龙玉柱:《百色发现的旧石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一九七五年第十三卷第四期;杨群:《白莲洞又出土了一批打制石器》见柳州博物馆编:《文物通讯》,第六期。

⑦贾兰坡:《山顶洞人》,一九五一年版。

⑧贾兰坡:《山顶洞人》,一九五一年版。

⑨李有恒、韩德芬:《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动物群》,《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一九七八年第十六卷,第四期。

⑩广西文物考古训练班、广西文物工作队:《广西南宁地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一九七五年第五期。

⑪据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梁剑儒同志调查材料。

⑫清·盛绳祖:《藏卫积略》;宋兆麟:《云南永宁纳西族的葬俗》,《考古》一九六四年第四期。

# 论桂林甌皮岩遗址的文化特征

张益桂 赵 平

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已发现了不少，但早期的遗址报道不多，因此，人们对这个时期的考古发掘和文化探索十分关注。一九七三年以来发掘的桂林甌皮岩洞穴遗址，经同位素碳—14测定，其蚌壳年代距今 $11310\text{bP} \pm 180$ 年（ZK279—I）①，动物骨骼年代距今 $7580\text{bP} \pm 410$ 年（ZK280）年②，这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年代最早的数据，因而引起了史学界和考古界的重视，同时也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碳—14测定的年代可供参考，甌皮岩遗址属新石器时代早期③；另一种意见认为，在石灰岩发育的地区，碳—14测定的年代偏高，就遗址的文化性质，应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偏早的类型④。我们认为碳—14测定年代法是一门科学，不可不信，但由于它有一定局限性，所以，其测定的绝对年代，也不可无分析地全盘接受。因此，要判断甌皮岩遗址的年代，就必须把碳—14测定的年代与对遗址的文化特征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答案。由于桂林地处“湘桂走廊”的南端，因而对甌皮岩遗址文化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判断它的年代，而且对认识远古时代中原与岭南的文化交往，认识岭南地区古代人类社会的继承与发展，也很有裨益。下面就甌皮岩先民的居住、遗物、葬俗所表现的文化特点，谈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 一、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风

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一系列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消灭的东西。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如此，在前一个时期，孕育着后一个时期的文化；而后一个时期，又保存着前一个时期的文化。这种情况在新旧交替时期尤为显著。处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偏晚的甌皮岩遗址，无论是在洞穴居住，还是在使用的器物及墓葬习俗等方面，都存在着浓厚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风。

（一）洞穴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就被人们用作天然栖所。甌皮岩先民虽然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人了，但他们仍然以天然洞府为家，过着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穴洞生活。尤其是他们在洞内对生活、墓葬的区划，几乎与旧石器时代晚期山顶洞人的处置完全一样。山顶洞人生活在洞口光亮的地方，死葬于洞后幽暗之处⑤。甌皮岩先民也居洞口中间部位。这里火塘密集，烧土层层叠压，螺蚌介壳和动物骨骼堆积很多。而在幽暗的左侧，杂物相对减少，墓葬却相对密集，目前出土的死者个体达三十五具，显然为先民们的丛葬地。这种生死之地的安置，不仅是人们生活的需要，也是人们生向光明，死归幽境，子孙居洞前守灵思想意识的反映。我们认为，甌皮岩先民和山顶洞人对生死安身的风俗规范，决不是偶然的巧合，尽管两者相隔近万年，相距成千里，但人类文化的继承和传播，并不因时间的消失而中断，也不因千山万水而隔绝。南北两洞古俗相同，不仅说明了新旧器时代文化的承袭关系，也是甌皮岩先民处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见证。

（二）打击石器是旧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人类发明使用打击石器的历史非常悠久，从

旧石器时代开始，直到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人们大量使用打击石器。甌皮岩出土的打制石器不仅在数量上远远多于磨制石器，而且在器形种类上也很少，目前所发现的仅有砍砸器、盘状器、刮削器以及石杵、石钻等。其形态具有旧石器时代的原始特点，同时，它的打制方法也较为原始，绝大多数使用单面打击法，只有极少数进行交互打击，因而多为单边刃，极少为双边刃，除了石片石器中的刮削略有修整外，其余大都没有进行第二步加工，这与广西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如柳州白莲洞、百色上宋村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打击石器相比，在制作方法上和器形上都有相似之处<sup>⑥</sup>。这些共同特性，显示了它们的上下继承关系。

(三) 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风在甌皮岩的葬俗中同样有反映。我们知道，在山顶洞人的饰终仪司中，已经使用赤铁矿粉末撒在死者的身上<sup>⑦</sup>，人们以红色代表鲜血，作生命的象征，借以表达活人对死者的尊重和哀思。甌皮岩先民继承了这种意识和古俗，在一位老年妇女和一位中年妇女的身上撒有赤铁矿粉末。这两位女性享有如此隆重的葬礼，既表明她们生前具有很高的威望，也说明万年古俗，犹有所承。

此外，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所发明的磨制和穿孔技术，以及用蚌壳装饰美化的风俗，也被甌皮岩先民继承了下来，而且获得了进一步的推广和发展。由此可见，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在甌皮岩先民中仍然浓厚地存在，这说明他们距离旧石器时代并不很远。

## 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先驱

甌皮岩先民虽然保存着浓厚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但是，他们已经不是旧石器时代的居民，而是新石器时的先驱者，这从他们制造的磨制石器、陶器以及相应的驯养业的萌芽，可以得到证明。

(一)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已经发明了琢磨和穿孔技术，比如山顶洞人就有了磨制的骨针，穿孔的石珠、兽牙和蜡壳等<sup>⑧</sup>。然而，这种新的技术在当时还没有能够推广到生产工具的制作上，除了缝纫的骨针、骨锥外，一般只使用在对装饰品的制作上。但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便开始将琢磨和穿孔技术应用到社会生产上。甌皮岩先民乃是接过这种新技术，大胆进行生产工具改革的先行者。他们在骨、角、蚌器的生产上，除了骨针、骨锥和穿孔蚌饰等生活用具和服饰品的制作外，还出现了极少量的骨鱼镖、骨、镞、角凿、蚌刀、蚌匕、蚌网坠等渔猎工具。这类器物的制作比较精细，它反映了渔猎经济在甌皮岩先民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为重要的是，标志着原始工艺技术大革命的磨制石器和穿孔石器也产生了，而且具有明显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风格。这表现在它的种类和数量少，磨制也较粗糙，就器形而言，它只有石铤、石斧、石矛、穿孔石器和砺石等；就磨制的程度而言，其中有通体磨制和刃部磨制两种，前者较少，后者居多；通体磨制的器物也重在对刃部的磨制，其他部位多保持砾石面，只做一般性处理，故有磨而不光的直观感觉。总之，甌皮岩先民所制作的磨制石器，无论是在器形上还是在磨制技术上，都具有显著的开创性，这是新石器雏形形的反映，也是早期新石器时代的特点。

(二) 陶器是新石器时代的重要里程碑。过去史学界和考古界曾以陶器来划分和命名新石器时代的各个文化分期，如所谓“彩陶文化”，“黑陶文化”，“几何印纹陶文化”等等。姑且不论这种分期方法是否妥当，但它说明陶器确有某种文化的代表性。甌皮岩大量陶器的出土，是它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一个标志。然而这种陶器具有初生的性质，其质地多为夹砂粗陶，泥质陶极少；其制作方法均为手制，露天烧造，故厚薄不均，火候甚低，色泽不

一；纹饰则以绳纹为主，次为划纹，这些都是早期陶器的特点。

（三）磨制石器和陶器的产生，以及相对的定居生活，孕育了原始的农业和驯养业。经科学鉴定，甌皮岩先民已经开始有了猪的驯养，其宰杀年龄为一至二岁，表现为初级阶段的驯养<sup>⑨</sup>。但是，在整个甌皮岩先民的经济生活中，仍然以渔猎采集为主。这种情形可从人们食后留下的大量螺蚌壳和动物骨骼得到印证。其中出土的动物骨骼有：鹿、梅花鹿、漓江鹿、獐、水牛、椰子猫、苏门羚、食蟹獐、山灵猫、竹鼠、板齿鼠、亚洲象等哺乳动物25个种属的动物群。

与这种经济形态相关的甌皮岩先民社会组织，还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繁荣阶段之前。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的葬俗中得到佐证，甌皮岩先民盛行男女老少单身丛葬；由于生产水平的低下，物质生活极端贫乏困难，因此死者没有葬具，除一人外，亦均无陪葬品；然而葬向却有男女之别，男性多数面向西南，即向洞外，女性则多向东北，即面向洞内。这种男向外，女向内，可能是当时族外婚的反映，即一个氏族的男子白天在本氏族内劳动，晚间到另一个氏族择偶而居。这种男子晚间集体出嫁正是新石器时代早期母系氏族社会的婚姻形态。

### 三、甌皮岩先民文化的踪迹

解放以来，随着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在我国岭南地区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遗存，如早期的甌皮岩遗址、中期的南宁地区贝丘遗址、晚期的广东石峡遗址等。这些古文化遗址，就各个发展阶段的序列来说，大体是衔接的。就地域分布来说，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多分布于珠江水系支流上游河谷平原的山洞里，然后沿着河流向东南发展，形成以几何印纹陶为特征的新石器晚期文化。

循着远古时代岭南文化的总走向，我们认为南宁地区的贝丘遗址与甌皮岩遗址在文化上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

首先，从葬俗来看，甌皮岩先民以屈肢蹲葬为主要葬式，次为二次葬和侧身屈肢葬。蹲葬，目前我国发现的地点，除了黑龙江矮砬达外，便只有甌皮岩和南宁地区的贝丘遗址<sup>⑩</sup>。这种葬俗表示人们祈望亲人死后仍然跟生前一样生活。当时甌皮岩先民平常在洞内制造工具，肢解禽兽，用炊分食，开会议事，以至休息睡眠，大多处于蹲式，亦可谓之屈肢蹲坐或“席地而坐”。蹲葬就是这种生前蹲坐常态的再现。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蹲葬之俗，直到解放以前仍流传在西南一些少数民族之中。如粤北瑶族，人临死之前，有将死者捆在坐椅上，（据说更古老之时是投入箩筐里）造成蹲坐形态，待其僵化后，再入穴埋葬<sup>⑪</sup>。藏族中的“地葬”、“水葬”，及云南纳西族的火葬，也都在死者断气之前，将其蹲坐捆扎，使之僵化，而后入葬<sup>⑫</sup>。我们知道，岭南是文明时代百粤（越）民族居住的地方，蹲葬产生和流传在这个地区，说明它既有地域性特点，也有民族特点。由此看来，甌皮岩先民的蹲葬，经过南宁地区贝丘遗址的先民，直到近代瑶族的葬俗，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在同一民族文化中，同时存在着多种葬俗，这一事实在各地遗址中都有表现。甌皮岩先民除了屈肢蹲葬外，还萌生一种二次葬，即拣骨葬。这种葬式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较多，特别是华南地区尤为普遍。如福建昙石山遗址和广东石峡遗址等处均有发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南宁长塘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所发现的数量最多。如果说甌皮岩先民的蹲葬风俗被长塘先民直接继承了下来，那末甌皮岩先民刚刚出现的二次葬则为长塘等先民所发

展了，并且长期流传在西南和华南民族地区。二次葬是在人死后，将尸体放在特定的地方，让其腐烂，然后将骨骼收集起来，另行埋葬。据认为，人们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人们有一种信仰，即认为血肉是属于人世间的，必等到血肉腐朽后，死者才进入灵魂世界，只有这时才能作最后正式的埋藏。又据民间传说，二次葬的意识有二：一是说家庭不兴旺，认为祖坟“风水”不好，需要另找新穴位；二是认为，凡是回老家的都得拣骨返籍，以求最后归宿。甌皮岩出现的二次葬可能与后者意识相近。因为甌皮岩的二次葬仅有两俱，一为子母合葬，子为二次葬；一为男性老者的二次葬，二者可能为非正常地死于野外，而后归葬洞中。这种葬俗是我国“叶落归根”思想的萌芽。无论是蹲葬还是二葬、屈肢侧身葬，死者均用灰土、烧土施埋，借以护尸。甌皮岩和南宁地区的先民在葬俗上的如此相同，反映了他们间的继承关系。

其次，甌皮岩先民的文化，还可以从南宁地区贝丘遗址中出土的工具、用具上觅见踪迹。（1）石器：两者的打击石器，无论是器形还是打击方法都比较接近。其磨制石器，都是以天然砾石稍经打击后即予琢磨，且多磨刃部，少为通体磨制；同时，两者的磨制石器都以梯形弧刃的斧、锛为常见。（2）骨蚌器：两者都有地域性特征的穿孔蚌网坠和蚌匕。甌皮岩遗址里的蚌网坠还是少量发现，蚌匕仅见一件，而南宁地区贝丘遗址则已大量出土。后者还发现前者所未有的蚌鱼钩、骨鱼钩、骨刀、骨匕等。（3）陶器：两者也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在陶质上，都是以夹砂粗红陶为主，泥质陶较少；在制作方法上，都是手制，因而器壁较厚；在烧造方法上，都是露天烧制，所以火候较低，色泽不一；在装饰纹样上，都以绳纹为主，划纹为次，且划纹均为几何形图案，其中水波纹、方格纹尤为典型。此外，在器型上，均为敞口，多为圜底器。不同之处，后者的器壁厚薄没有前者那样严重不均这可能是前者使用手糊塑型，而后者采用盘条泥筑法。两者在工具和用具上存在着大同小异，大同，说明它之间有着直接的交替关系，小异，则说明后者有了新的发展。

综上所述，甌皮岩遗址应属新石器时代早期偏晚的类型，其年代距今大约八千年左右。甌皮岩遗址的文化，既存在着浓厚的旧石器时代的遗风，又具有明显的新石器时代的开创性。甌皮岩先民的这种文化，被后来以南宁地区贝丘遗址为代表的先民直接继承下来了，并一代一代地发展为文明时代的百粤（越）民族文化。至今，生活在我国华南地区的兄弟民族，无论他们盛行的二次葬（包括解放前粤北瑶族存在的蹲葬）还是系刀于腰，喜欢生食某些肉类，以及他们服饰、织锦上的几何图案等等，都可以在甌皮岩先民文化中找到来源。史迹证明甌皮岩先民是今天华南地区兄弟民族的一支祖先。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组成的，甌皮岩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再一次证明，从很早的时候开始，我们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上。

#### 注：

- 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四），《考古》一九七七年第三期。
- 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五）：《考古》一九七八年第四期。
- ③王克荣：《建国以来广西文物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九期。
- ④夏鼎：《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一九七七年第四期。

（下转9页）

# 从考古发现探讨历史上的西瓯

· 蒋廷瑜 ·

秦以前，在我国东南沿海乃至越南中部，环居着种姓成份复杂的少数民族，史书上常统称之为“百越”。诚如唐人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引臣瓚所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越）杂处，各有种姓。”其聚居岭南最著者当推西瓯和雒越。但梁顾野王在《舆地志》中说过：“交趾，周时为骆越，秦时为西瓯”，颜师古注《汉书·南粤王传》时就说：“西瓯即雒越也”，把西瓯、雒越混为一体。因而不少学者认为西瓯与雒越实为同族异名。其实细检有关历史文献，西瓯、雒越虽同属百越，却是两个不同的部族，各自有其活动的时间和地域。

西瓯又作西呕，最早见于汉代人追述秦代和西汉时事的著作。例如刘安《淮南子·人间训》述秦始皇平定岭南时，就说对秦军“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于宋”；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说到南越王赵佗“以兵威边，财物赂遣闽越、西瓯、骆，役属焉”；班固《汉书·南粤王传》说：“蛮夷中，西有西瓯，其众半赢，南面称王。”西瓯也可简称之为瓯，在《逸周书·王会解》中已经提到，其位置在商之“正南”，又说“瓯人蜚蛇”。

骆越的名称出现稍晚，《汉书·贾捐之传》说到海南岛的情况才提及“骆越之人”，《水经注·温水》引《林邑记》也提到“骆越”。之后《后汉书·马援传》说到马援“于交趾得骆越铜鼓”和“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后汉书·任延传》也讲到当时九真郡的居民叫“骆越之民。”比这些还早的文献多称之为“骆”，如前引《史记·南越列传》记载赵佗役属周围部族就是。

由于西瓯与骆越毗邻和错居，史书上又常常以“瓯”“骆”并称，如《史记·南越列传》载南越王赵佗上汉文帝书，述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汉武帝平南越时，“越桂林监居翁谕告瓯骆属汉”；桓谭《盐铁论·地广》有“荆楚罢于瓯骆”的话。

西瓯活动的时间下限只到西汉中叶，自汉武帝平南越，在岭南重新划分郡县以后，这个族名就在历史上消失了。骆越继续存在的时间较长，如前所引，到东汉时，任延守九真，马援征交趾，还见骆越之名。

西瓯和骆越不但名称不混，而且活动地域也是明显有别的。从《盐铁论》“荆楚罢于瓯骆”一语来看，西瓯、骆越应是与荆楚为邻的。《淮南子·人间训》说，秦始皇“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完全是针对五岭以南的。据考证：镡城之岭为今之越城岭，九疑之塞为今之萌渚岭，番禺之都为今之骑田岭，南野之界为今之大庾岭，余干之水为今之都庞岭<sup>①</sup>。秦军分水陆五路进入岭南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南岭山区地形复杂，气候多变，秦军遇到很大困难，以致“三年不解甲驰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只好“以卒凿渠而通粮道”。粮道凿通以后，再与越人战，才杀掉西呕（瓯）君译于宋，结束这场战争。秦监禄所凿之渠